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总主编 李璐

政治传播教程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郭晓科 著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列教程 总主编 李佩

政治传播教程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郭晓科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传播教程 / 郭晓科著. —北京: 法律出版

社, 2014.8

ISBN 978 -7 -5118 -6718 -6

I. ①政… II. ①郭… III. ①政治传播学—高等学校
—教材 IV. ①DD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6168 号

政治传播教程

著 者: 郭晓科

策划编辑: 王旭坤

责任编辑: 张 磊

装帧设计: 乔智炜

责任印制: 沙 磊

内文制作: 凌点工作室

出 版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http://www.lawpress.com.cn/>

编辑统筹 法律职业教育出版分社

经 销 新华书店等

总 发 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lawbook.com/>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029-85388843)

重庆(023-65382816/2908)

上海(021-62071010/1636)

北京(010-62534456)

深圳(0755-83072995)

销售专线 010-63939806/9830

数据支持 法律门 <http://www.falvmen.com.cn/>

开 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69 千

版 本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7 -5118 -6718 -6

定 价 22.00 元

所有权利保留。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编委会

主任：李希光 欧阳宏生

编委：李希光 欧阳宏生 赵中颉 李 珮 罗小萍
李 韬 蒙晓阳 郭晓科 贺 艳 王 炬
陈笑春 裴永刚 蔡 斐

主编：李 珮

副主编：李 韬 罗小萍

总序

进入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化、大改革，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积极融入到这一改革、实践与竞争之中，努力打造符合时代发展的、富有特色的新闻传播教育。

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筹建于1994年，原名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995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在全国法科大学中，最早设立新闻学本科专业招收本科生，近20年来，形成了“媒介·法律·社会”三者融合并重的办学特色。2010年1月，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更名为“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同时提出鲜明的办学指导思想与发展定位：以全球新闻视角打造国内一流新闻传播学科。这是为适应中国国力提升之后全球新闻传播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充分整合国际国内资源，在法制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拓展建立国际化办学模式，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的一次大胆创新。

学院成立这20年，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经历世纪之交的20年，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迅速发展的20年。21世纪的中国，全球化和互联网带来了新闻传播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新闻传播教育正迎接这一变化带来的巨大挑战，首先，新闻传播教材需要与时俱进，更新和调整，以培养能适应未来发展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

基于此，学院跟踪现代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最新进展，策划了本套丛书，其中包括本科生教材10本，研究生教材3本。这套丛书，作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指导性和启发性的教材，集中体现了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的传承与创新。

这套丛书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基础性理论的梳理和新领域的探索，力求做到理论有创新，观点有突破，论证有力量，避免与传统新闻传播学教材简单的

重复。

特点之二是结合当下新闻传播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强调新闻教育的实务特色，力求开放性、操作性与实践性，努力为学生提供能够与实务部门相衔接的课程内容设计。

特点之三是经典理论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相得益彰。既有新闻采写、电视采编、国际新闻、文献导读等经典研究的新探索，也有网络舆论、媒体评论、政治传播、文化产业等跨学科的新成果。

这套丛书，分别代表了我院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在新闻与法治研究、国际新闻研究、影视与新媒体研究、政治传播研究等四个研究方向的探索和思考，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我院新生代学术实力的一次整体亮相。我们真诚地期待读者对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列丛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是为序。

李 珮

二〇一五年一月毓秀园

前　　言

2012年年初,西南政法大学着力重点发展一批特色优势学科,并支持在新闻传播学院成立政治传播科研创新团队,作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传播学科方向的孵化器,由我担任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并担纲研究生教材《政治传播教程》的编写工作。接到任务后,我力求通过这部教材能够全面、系统、客观地介绍政治传播的基本理论和该领域研究的进展,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兼顾理论性和实用性,并对研究生的培养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自2012年起,我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传播话语权研究》,对国际政治传播有了更深入的系统研究,这本教材的编写也受益匪浅。

政治传播不同于科技传播、文化传播等其他领域的传播,政治传播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更准确地来讲是为执政党和国家服务,因此政治传播研究的视角必须着眼于国内,解决我国当前在政治传播实践领域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国政治传播研究如何处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需要找到平衡点。

总体来讲,我国传播学研究处于全球“中心一边陲”的边陲地带,我国学者在传播学界缺少标志性成果和话语权,政治传播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从全球最权威的政治传播学术刊物《政治传播》的论文发表情况来看,其作者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统计显示,从《政治传播》2001年到2011年的论文发布情况来看,论文的地区分布是极不均衡的,除了美国一家独大之外,其他几乎都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论文,来自亚洲和非洲地区的论文数量为零。^[1]

一方面,我国政治传播研究需要提高国际影响力。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政治传播环境正在快速发生变化,并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难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既是政治传播研究者的责任,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国学者不能孤芳自赏,失去国际对话的自信和能力,有责任提高自身的国际对话水平,向西方介绍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经验和成果,尤其是要使用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把中国政治传播实践进行理论化的总结和提炼,

[1] 邵培仁、张媛:“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现状与趋势——以SSCI刊物《政治传播》为分析样本(2001—2011)”,载《新闻前哨》2012年第9期。

与世界各国进行对话交流,提升我国政治传播话语权。

另一方面,要警惕全面套用西方的理论模式,政治传播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维护国家基本制度,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与合法性,提升国家软实力。如果全盘照搬西方理论模式,则陷入西方话语陷阱,不仅无助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发展,反而有百害而无一利。

因此,在中国开展政治传播研究,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站在国家立场上,积极吸收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等先进成果,若想提高国际对话能力,就要从中国实践出发,努力解决我国政治传播领域的突出问题,建构具有中国气派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

邵培仁等通过对《政治传播》近十年来所刊载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近十年来全球政治传播研究热点分布于以下主题:^[2]

1. 政治信息(*political message*)传播研究,如政治修辞学、政治宣传、政治广告等;
2. 政治与媒体研究,如媒介环境与政治参与的鸿沟、媒体与政治人物、新闻报道与政治竞选、议程设置与议程建构等;
3. 公共舆论与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4. 政治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如新媒体与公民社会、互联网对舆论的影响、网络政治竞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网络政治文本分析等;
5. 国际政治传播。

上述多数热点主题都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相契合,如互联网对舆论的影响、政治宣传等。由于政治制度不同,其中也有一些主题在中国会“水土不服”,或没有研究的必要性;还有一些议题,已经不再是西方研究的热点,但在中国是面临的新问题,仍然需要开展重点的研究,如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新闻发言人语言艺术等。

作为一部研究生教材,本书立足中国现实,力求面向全球政治传播研究的热点,分别从政治传播的本体、主体和客体对政治传播研究进行全面的、系统的介绍,但本书难免尚有疏漏和偏颇之处,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着眼于政治传播的本体,分别讨论了政治传播的内涵、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剖析了政治传播的两个核心——政治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政治传播是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开展政治传播研究,应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政治服务,解决我国政治传播领域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维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2] 邵培仁、张媛:“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现状与趋势——以SSCI刊物《政治传播》为分析样本(2001—2011)”,载《新闻前哨》2012年第9期。

权,是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

第三章和第四章从政治传播的主体视角出发,分别讨论了政治传播符号与政治传播效果。政治传播符号学着眼于政治传播主体如何运用政治符号、政治修辞进行有目的的说服,政治传播效果的研究贯穿于传播学发展始终,传播学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重要理论都源于此,如议程设置效果、框架效果、沉默的螺旋效果等。

第五章和第六章从政治传播的客体角度,分别讨论了舆论引导和国际政治传播。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说,政治传播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传播活动影响目标受众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行动,维护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受众研究一向是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受众”这个概念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掩盖了公众作为政治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受众不是被动地接受各类政治信息的影响,他们本身也是政治传播的参与者,甚至是政治信息的制造者和传递者。受众的研究一般是从舆论学的角度切入,迄今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

经过两年的努力,这部教材终于付梓。在过去一年多里,我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了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舆论引导力与社会舆情预警系统研究》和西南政法大学李珮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环境下突发事件的传播与管理》,参与上述两项科研工作对于本书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在此对两位专家表示深深的感谢。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传播科研创新团队的各位专家学者从各自的学科领域对本书的成稿提出了真知灼见,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课程《政治传播》的同学们在课堂上讨论也对本书做出了有益的补充,我指导的研究生胡秀娟同学为我的课堂教学进行了文字整理,以上各位良师益友都对本书的成稿做出了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给予的理解和支持。

郭晓科
2014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政治传播概观	(1)
第一节 什么是政治传播	(1)
第二节 开展政治传播研究的意义	(5)
第三节 政治传播与传播学的学术渊源	(9)
第四节 复习与应用	(13)
第二章 媒介化政治	(15)
第一节 媒体:影响政治的重要变量	(15)
第二节 新闻:媒介化现实	(25)
第三节 新媒体的影响	(27)
第四节 复习与应用	(37)
第三章 符号与政治修辞	(39)
第一节 与政治修辞有关的重要概念	(39)
第二节 意义的争夺和斗争	(44)
第三节 政治修辞的艺术	(46)
第四节 复习与应用	(52)
第四章 政治传播效果	(54)
第一节 媒介效果研究的四个阶段	(54)
第二节 认知层面的影响	(57)
第三节 态度层面的影响	(64)
第四节 意见气候的形成	(68)
第五节 复习与应用	(73)

第五章 舆论	(74)
第一节 什么是舆论	(74)
第二节 网络舆论	(78)
第三节 舆论与群体性事件	(88)
第四节 如何开展舆论引导工作	(99)
第五节 复习与应用	(109)
第六章 国际政治传播	(111)
第一节 什么是国际政治传播	(111)
第二节 国家形象	(112)
第三节 国家软实力	(115)
第四节 国际话语权	(119)
第五节 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信息主权	(126)
第六节 复习与应用	(137)

第一章 政治传播概观

本章目的

本章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政治传播”研究概况与知识脉络。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以下问题：

1. 什么是政治传播
2. 政治传播的学科渊源
3. 政治传播研究的意义

本章要点

1. 政治传播的定义
2. 开展政治传播研究的意义
 - A. 国内视角
 - B. 国际视角
3. 政治传播与传播学的学术渊源

第一节 什么是政治传播

政治传播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是政治学与传播学交叉融合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由于关注领域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迄今为止传播学已经衍生出了各类专门领域的分支,如健康传播、科技传播、环境传播、影视传播、文化传播等,政治传播也是这个大家族的一员。

什么是政治传播?顾名思义,这一概念包含两个关键词,即“政治”和“传播”。

“政治”一词源自古希腊语 *πολιτικ*,最早见于《荷马史诗》,是城邦的意思。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政治学的功用既在于首先建立一个城邦,同时又在于管理好所建立的城邦。可见,早期的“政治”概念是指城邦的公民进行统治、管理、斗争等参与各种公共事务的行为的统称。

近代对于“政治”的描述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德国学者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

概念》中的论述,他认为: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通俗而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概念的内涵。据记载,毛泽东曾问田家英,什么是政治?田家英一口气讲了许多条条道道。毛泽东笑了,说:“政治没你说得那么复杂,我们的政治,就是怎么令敌人越来越少,令同志越来越多,朋友多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敌人多的政府就是坏政府。”^[1]

【案例 1.1】“枪杆子”和“笔杆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啊,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啊,呀呼嗨嗨,咿呀嗨……”。这首《解放区的天》是刘西林先生在 1943 年根据冀鲁民歌曲曲调填词而成,寥寥数语的歌词把“明朗的天”、“民主政府”、“共产党恩情”等关键词以及人民的欢天喜地巧妙地融为一体,节奏明快,朗朗上口,这首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毛泽东说,干革命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而他自己从没摸过枪杆子,笔杆子倒是从不离手。虽然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但共产党早期枪杆子不够硬,更主要是靠笔杆子(即政治传播)来发动群众的革命力量。笔杆子的力量在于争取民心。当时国统区的核心——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地处四川盆地东麓,雾气缭绕,连年阴雨,终日难见阳光,“蜀犬吠日”就是对这一地区自然气候的真实写照。对于生活在国统区的百姓来说,“暗无天日”已经不仅是对自然气候切身感受的描述,而且更会引起人们对当局政治腐败的联想。听到这首来自解放区的欢快激昂的《解放区的天》,人们自然会真心向往解放区的光明。所以说,这首歌曲就是成功的政治传播实践案例。

传播学是舶来品,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同样深受西方的影响。政治传播研究最早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政治学》等著作就涉及政治修辞等内容,柏拉图的《法律篇》中也有一些关于政治辩论技巧的论述。

西方学者在论著中界定“政治传播”这一概念时都谦虚地申明这仅是一家之言;西方对于“政治传播学”的使用则更加谨慎,因为它能否成为一个学科还存在很大争议——政治传播学科的形成,需具备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范畴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成果的系统性。

时至今日,政治传播研究虽然已经呈现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政治传播研究的独立性尚未形成,尤其是缺乏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畴。因此美英学者使用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也一般译作“政治传播研究”,而不能译为“政治传播学”。

[1] 蒋晓飞:“政治三问三答”,载《政府法制》2012 年第 26 期。

下面分别从西方视角和中国视角来审视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

一、西方视角

西方理论界对于政治传播概念的早期表述为：“政治传播是一种过程，一种有多种因素在其中相互影响的过程；政府及其辖设的社会事业机构与公民的选举行为两者不断地向对方传达政治性影响因素。”^[2]

美国学者丹顿和伍德(Denton & Woodward)认为：政治传播是关于公共资源(如税收)、政府权力(具体由谁来掌握司法权、立法权以及行政权)和公共裁决权(奖惩制度)的分配所进行的决议。^[3]

上述两个定义都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传播看作是政治行为过程的重要因素，此外，传播还影响到公共资源、权力与价值的分配。

布莱恩·麦克奈尔(Brian McNair)在《政治传播学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Communication*)中将政治传播的定义简化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活动”。

查菲(Chaffee)则认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4]

显然，以上定义是从传播学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从这一视角来看，所谓政治传播，其实质仍然是人类的传播活动，只不过其传播的目的是“政治”，传播的过程是“政治过程”。

因此，张晓峰教授在著作《政治传播研究》中指出，目前西方在政治传播概念的界定上有两种趋向，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从政治学角度出发，往往将政治传播视为一种政治现象与政治行为；与之相对的，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则重在揭示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种学科本位的视角无可厚非，但不利于政治学和传播学对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融合。具体来说，政治学者往往是带有一种工具性的色彩去研究政治传播，其研究重点仍然是政治治理的过程与行为；而传播学者仅仅是把“政治”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仍然沿用传播学的一套固有的范式、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去开展研究，政治传播研究者也可以用同样的理论体系去研究环境传播、科技传播、健康传播等其他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两个学科无法深入融合，形成新的交叉学科，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学者也都是在各自学科领域自说自话，缺乏真正的学术对话交流，进而政治传播的发展成熟更是无从谈起。

[2] Lynda Lee Kai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4, p. 15.

[3] Denton R E, Woodward G C,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1990, p. 14.

[4] Lynda Lee Kai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2004, p. xiii.

二、中国视角

我国学者邵培仁对政治传播的定义为：“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5]

邵培仁教授于1991年著的《政治传播学》对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早期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全书对政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作出了中国视角的界定。但诚如作者所言，此书目的只在于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门学科之间架起桥梁，理论体系还较为粗糙，从概念的界定来看，该书的理论框架深受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的影响。实际上，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网民规模不断扩大，互联网为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话语空间，传播者和受传者的界限日益模糊，这个概念的界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政治传播的界定又有了新的认识。

有学者从“政治”与“传播”融合的视角提出政治传播的概念界定：“所谓政治传播是指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政治本身就是传播，没有传播的政治是不存在的；‘政治’与‘传播’既不是平行关系，也不是机械合一，而是从‘生成’的角度，既强调政治形成中的传播因素或层面，又强调传播形成中的政治对象或内容，政治与传播作为一种要素内在融合，形成一个具有完整内涵的新的独立范畴，即政治传播”。^[6]

上述概念可以作为广义的“政治传播”概念界定，它首先强调了政治传播的边界，即“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传播过程并非从“传者”到“受者”的单线性传播，而是“信息扩散”的过程，同时还强调政治与传播学科的融合，这就为开拓独立的政治传播研究范畴提供了可能。

但是，上述概念在实际应用中容易导致泛化“政治传播”，一般而言，政治传播是以政党或政府为主体，开展有目的的政治传播活动。因此，段鹏教授对政治传播提出了一个狭义的界定：“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即政府（政治家、政治组织等）、媒体（通常是大众传播媒介）、公众。政治传播可以看成是这三个要素之间进行政治信息传播和反馈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传播者利用意义符号，通过媒介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信息的行为过程。”^[7]

三、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

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是极为类似的一对概念，在实际应用中非

[5] 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6] 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载《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

[7] 段鹏：《政治传播：历史、发展与外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常容易混淆。什么是传媒政治？“传媒政治是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和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的一门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就它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来说，它指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形式，是关于传媒的权力构成和权利分配。”^[8]

麦克奈尔在《政治传播学引论》中已经非常明确把“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做了区别：政治传播讲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9]而传播政治指的是以政党等为主体的通过政治广告、政治公关等形式为自己的竞选而做的具体行为。传媒政治中的“媒介”只是政治的工具而已。

政治传播，着力的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这种理解中，政治与传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均居“本体”地位；而所谓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立足于被工具化的传播，以单纯的传播为“本位”，研究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功能。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的差别在于，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与传播的地位及其关系。^[10]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终端的普及化，媒体在人类社会日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信息不仅通过传统的广播电视、报纸报刊传播，还通过网络论坛、个人博客、朋友圈、微博等新兴媒介传播，无论传播的内容涉及何种信息，如对空气污染、交通拥堵、食品安全等话题的讨论，实质上任何上述话题又都隐含政治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任何政治治理、政策制定、政策推行等政治的过程又都离不开传播。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在此背景下开始向纵深发展，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已经开始着手建构政治传播的学科体系。

应当强调的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政治服务，解决我国政治传播领域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维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是我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

第二节 开展政治传播研究的意义

政治传播体现的是在特定的政治系统中传播主体对于资源、权力与价值的权威配置的沟通与协商过程。在中国，传播主体首先是执政党和政府，然而，各利益

[8] 李宏主编：《传媒政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9] [英]麦克奈尔著：《政治传播学引论》，殷祺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0] 荆学民、刘胜君：“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载《现代传播》2013年第7期。

集团(包括境外势力)及其代言人也通过传统媒体或新兴媒体渠道(如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对舆论施加影响,传播主体各方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说服力,决定了政治生态与政治合法性的变化;媒介通过控制政治信息的流通,也能够对公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倾向产生影响,从而对政治合法性产生影响。

开展政治传播研究的意义在于指导我国政治传播实践,对内维护政治稳定,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确保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目标,对外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提高国际传播话语权。

一、维护国内政治稳定

从国内情况来看,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就。但由于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环境污染等各类矛盾的迅速积累,我国进入了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阶段,如果处置不当,则可能酿成巨大灾难性后果。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在《中国:一个易碎的超级大国》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经济增长;但是,快速增长日渐出现副产品,群众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和暴力抗议。”^[11]公众的不满情绪首先是通过舆论表现出来,经过酝酿发酵,还可能从意见流演变成行动流,形成群体性事件和暴力抗议。但是在各类群体性事件中,我国各级政府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不足,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乏力,甚至一些媒体使用“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等语言,进一步激化矛盾,丧失公信力。

总体上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常常达到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

2009年9月,中共《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群体性事件”作为新词被收入其中,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是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目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类是突发事件引发的集体行为和集体行动。例如,发生在湖北石首的群体性事件,起源于一个厨师的自杀,由家属“护尸”和警察“抢尸”矛盾引发,最终导致了几万人的聚集和对抗。第二类是有组织的群体抗议,其组织性、目的性、破坏性都比较强,有较明确的政治目标。

^[11] Shirk Susan L, *China: The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